

# 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

李秀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秀林

# 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

# 时代精神的哲学反思

李秀林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华生印刷厂排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15.75 插页5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91 000 册数: 7 001—17 000

ISBN 7-300-00186-6/B·22

定价: 3.80元

# 序

肖 前

---

适逢秀林逝世周年之际来作这篇序，我心里感慨万千。

秀林是我的学生，又是共事多年的挚友。我深知他是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勤奋治学、才思敏捷、文路豁达的哲学家，一个严于律己、与人为善、胸怀坦荡的人。他的早逝，于我是很悲痛的；这悲痛不仅是发自个人情谊，也是出于对我国哲学事业的考虑。假如秀林健在的话，正是年富力强、心情舒畅、学术研究大有作为的时候，他一定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秀林一生著述很多，这本文集所选篇目是有代表性的。内容大抵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宣传与教学；二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实际相结合，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展开来看，他的理论建树和给人的启迪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以真诚的态度坚持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以反思的精神发展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文集的前11篇可以看到，秀林青年时代的精力主要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习、研究和阐述上。后来编入《你能划清这些界限吗？》一书中的系列短文，

以清晰明快的思路，纯朴实在的文风，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唯物辩证法，从理论高度冷静地触及了当时的“大跃进”左倾冒进现象，其中有些见解至今读来仍是颇有教益的。“文革”中，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极左路线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肆意践踏，秀林同我一样痛心疾首。粉碎“四人帮”后，他立即投身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一方面直接批判“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精神万能论”，一方面通过自身的马列主义再学习，发表一系列文章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实践观和阶级观，配合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更为可贵的是，秀林不仅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战士，而且是敏锐把握时代精神、迅速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发展和突破的一个理论先锋。1980年以后，他曾不断地复述“哲学应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句话，认为哲学要发展，就必须反映时代精神并“遵循真理本身的规律去发展真理”。这时他明确意识到，哲学思考本质上是一种与迅猛发展的实践相联系的批判的、创造性的思考，“哲学问题应通过它去掌握、去丰富、去修正，甚至推翻”。秀林的这种反思精神，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创造性地探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逻辑。秀林是一个现实感、使命感很强的哲学家，当民族历史的进程如火如荼的时候，他绝不会将自己关在书斋里。从文集中可以看到，他的大部分文章是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而做的，不过这种结合是一种很高层次的结合。即如秀林所说的，一方面，“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要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石上”，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要进行哲学思考和提炼概括”。两方面秀林做得都是有分寸、有节度的，既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观点指导对现实社会主义的研究，又不拘泥于个别原理；既大胆从时代经验中提炼新的哲学观点，又不背离最基本的原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原则》、《共

性个性的辩证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逻辑》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哲学思考》等几篇重要文章中，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在坚决摒弃照搬西方一套的同时，也反对继续照搬50年代苏联的模式；指出，在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必有其独特的建设现代化的逻辑，探讨这一逻辑，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天职。他承担了国家重点科学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计划从我国的生产、生活、管理、思维和情感等方面入手考察现代化的目标，从动力开发、现实矛盾和体制改革入手考察现代化的进程，从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入手考察现代化的主体。尽管他没能亲手完成这一设想，但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可贵的思路。最后几年，他非常偏爱并一度热衷于社会有机体理论，还计划撰写一部“社会系统论”的著作，恐怕都与建立他所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逻辑”有关系。社会有机体这一范畴，更强调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有机性，尤其是以经济为基础的，经济、政治、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诸方面的深层联系和相互制约。秀林在《论社会有机体》一文中曾运用这一观点于改革研究，明确指出改革必须做到政治、经济、文化系统配套。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不为过时之论。

第三，同我国其他哲学工作者一起，为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体系作出自己的探索，并着力研究和改进教学方法。早在1959年，秀林就参与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1960年，他又参与了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1979年以后，秀林、永祥和我一起主编了哲学专业教材《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与王于、淮春一起主编了高校文科哲学教材，并负责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这些哲学教材，都是建国以来发行很广、影响很大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前进，马克思主义要发展，教材体系也要改革；然而这些教材曾使一两代人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提高了成千上万党政干部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水平，这一点功绩，是不能由于时代前进了就予以否认的。

秀林还是较早、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法的人。1979年，他与人合作，系统总结建国30年来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经验教训，写了《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他在1983年提出“哲学教学法应该是一门科学”，并给哲学教师进修班开了讲座，后来整理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法纲要》。他提出哲学教学要“晓之以理、辅之以形、动之以情和导之以行”这四条基本要求，<sup>①</sup>并曾设想撰写一部“哲学教育学”专著。

秀林的理论生涯，充分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修养与现实精神、坚定性与创造性、言与行的统一。秀林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他是一个孜孜不倦追求真、善、美的人。正是这种追求，使他理论上日臻成熟，人格上不断完善，成为年轻人的良师，同辈人的益友。当死神无情地逼近他时，他愈益“求真、向善、爱美”。他在日记中描述自己此时的思想是“返朴归真式的思考……把人的一切善良的美德都渗透在思考的过程和成果中……这种死之将至时的思考，将人生一切都视为美好……求真、向善、爱美，这一人之为本性，在生死交割时显得格外突出。”秀林心灵的体验是虔诚的、恳切的，使我们每一个有幸继续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更深切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勇敢地向着真理攀登。

1987年3月

# 李秀林传略

汪永祥 郭 湛

---

在解放后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中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李秀林教授，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在国内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一生勤奋刻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中卓有建树。

## 勤奋求学的岁月

李秀林，曾用名李文辉，笔名裘麟、蔺晖、修林等，原籍山西省襄汾县。1931年2月25日（旧历正月初九日），诞生于汾河岸边襄陵镇一个贫苦农民兼船夫的劳动家庭里。家乡的山山水水，是幼年李秀林精神成长的自然摇篮。晋南凝重的山岗和土地铸就了他坚毅的性格，奔流不息的汾河水内化为他不懈的人生追求。

少年时代的李秀林聪敏好学，力求上进。1937年2月，开始入襄汾县襄陵城关小学读书。在抗日战争的动荡年代里读小学的李秀林，萌发了强烈的爱国意识。1944年7月，他小学毕业，不愿去离家较近的沦陷的临汾上日本人办的中学，当亡国奴，宁肯走50



里山路到离家八九十里以外的条件艰苦的乡宁第四联合中学（抗战胜利后改为新绛中学）去读书。1947年初中毕业，先后就读于临汾中学（高中）和临汾师范。由于他刻苦努力，学习得法，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始终是学校的优秀学生和同学中的活跃人物。

1949年8月，李秀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大学教育系。此时，刚刚解放不久的太原和全国一样，到处充满着革命和进步的气氛。李秀林怀着解放带来的喜悦和兴奋的心情，尽情享受新中国给青年人创造的学习机会，热忱接受党的教育和系统的学习任务。他一方面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积极为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大业准备条件；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迫切要求进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热情投身于当时开展的各项政治活动。在这期间，他开始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很快成为学校中开展各项活动的先进分子和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1950年1月，他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不久就担任校团委的领导职务和山西省学联的副主席，并代表学联参加省政协会议，出席过在京召开的学生代表会议，是当时山西省学生界的领袖人物之一。

1953年8月，李秀林在山西大学教育系毕业，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深造。他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来到人民的首都北京，来到当时全国马列主义教育的中心，接受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始把他的一生同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1954年7月，李秀林实现了多年的政治愿望，成为全班第一个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更加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的直接教育和领导，更加激情洋溢地投入专业学习和所担负的社会工作。

这一时期，他不仅是学习上的模范，而且在担任团支委和学习班长的工作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特别是他在理论学习上刻苦努力，勤于思索，敢于提出问题，善于总结经验，因此成长迅

速,成就斐然。在这两年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和社会工作的锻炼中,他各方面的才华和能力进一步得到系统锻炼和提高,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知识性、普及性的哲学文章。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内容是解释何为形而上学,刊登在北京一家报纸上。李秀林的文章,以其深邃的理解、明晰的思路、严谨的逻辑、饱满的热情和优美的文字,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 年轻的“主力队员”

1955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筹备建立哲学系,急需补充教学力量。李秀林提前一年毕业,调教研室任助教,立即投入教学工作。他结束了近20年的学习生活,成为新中国理论教育战线上的一名新兵,开始用学到的知识和能力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

自从走上教学工作岗位,李秀林就担负起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很快成了教研室里一名充满活力的“主力队员”。他既自己讲课,又给老教师当助手,参加辅导工作;白天给本科生上课,晚上又承担夜大学的教学任务。尤其是在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里,他还得完成研究班最后一年的学习任务,其紧张程度是可以想见的。这时,他正处于精力旺盛、政治热情高涨的青年时期,经常不知疲倦地、夜以继日地学习和工作。他几乎每天晚间都“开夜车”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又开始新的工作。正是由于他的勤奋,使他的聪明才智得以迅速提高和发挥,并在教学实践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很快适应了从学习到教学的转变,在教学中取得出色的成绩,获得了好评。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于1956年8月正式建立。李秀林和肖前、陈先达一起担负了研究班的教学工作,他还担任班主任。随着教学对象的改变和教学要求的提高,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更严了,并在积极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始了科学研究活动。1957

年，他参加编写的《哲学名词简明解释》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实践中深知广大干部和群众渴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自觉地把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使之通俗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

1958年，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浪潮，刮起了一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飓风，引起社会的极大的振荡和人们头脑里的一系列问号。一向勤于思考的李秀林，这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渐趋成熟，开始观察实践的过程，感受时代的脉搏，试图用所学的理论回答实践中的问题。他十分关心实际生活，力求使自己成为一个紧密联系实际的理论工作者。针对当时实践和人们认识中的种种问题，李秀林应《政治学习》杂志之约，撰写了一组论划清认识界限的短文，1959年陆续刊登在该杂志上。这些短文有：《重视条件和“唯条件论”》、《积极性和急性病》、《尊重经验和墨守成规》、《自信和骄傲》、《理想和空想》、《原则一致和千篇一律》、《相对和相对主义》、《决断和武断》、《从实际出发和右倾保守》、《脚踏实地和裹足不前》等。这组文章后来经过作者修改和补充，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你能划清这些界限吗？》及其“续集”中。李秀林还与肖前合写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一文，发表在《哲学研究》杂志上。这篇论文和上述一系列“划界限”的短文，反映了李秀林那时的思想倾向。虽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还不可能从本质上认清“大跃进”的错误，更不可能否定它；但这些文章表明，他确实已经看到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浪潮背后存在的很多违反客观规律的现象，并力图从理论上有所说明和澄清。这对于处在那种历史条件下的一名青年教师来说，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

1959年底，人民大学组织力量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李秀林是参加编写的主要成员之一。该书于196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同年春，李秀林被提升为讲师，

参加了在中央党校召开的全国哲学教科书讨论会。会后，北京市组织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合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1961年、1962年北京出版社内部出版），李秀林为这两本书的编写做了大量工作。不久，中央决定在各地编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编写一部全国统一的高水平的哲学教材，由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任主编，李秀林参加了编写工作。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于1961年初版发行，1978年修订再版，是解放以来我国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哲学教科书。在这些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李秀林虚心向前辈学习，刻苦钻研，深入系统地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理论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并开始形成一些自己的独立见解，构成他的理论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参加教材编写工作的同时，李秀林仍然在校内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有时在本系给研究生班或本科生讲课，有时担任外系共同理论课的教学。由于他态度认真，方法得当，能把编书和科研中的成果及时运用到教学中，因而无论在基本原理的阐述上，还是在理论结合实际上，以及在教学方法上，都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获得了普遍的好评。60年代初，他的教学经验曾在全校总结推广，成为青年教师的优秀代表。

随着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出版和大量发行，宣传和辅导该书学习的任务提上日程。《教学与研究》杂志从1962年起办了辅导学习的专栏，李秀林成了这个专栏的主要作者。1962年至1964年，他陆续发表了辅导哲学原理教学的文章十余篇（其中有少数几篇与别人合写），对提高我国哲学教学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前线》杂志于1963年开辟“政治理论常识讲座”专栏，李秀林应约写了六讲，通俗而又系统地阐明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

1964年秋，遵照党中央关于“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学校决

定进行半工半读试点，哲学系本科一年级被定为试点班之一。为搞好这一试点工作，哲学系组成了一个由系、教研室领导及各门课任课教师和辅导员参加的强有力的教学组，李秀林是这个组的重要成员，担负该班哲学原理课的教学任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以社会为工厂”，先后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和京郊农村一边教学，一边劳动，一边搞社会调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哲学教学一改过去死抠书本的习惯，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尝试引导学生用所学的理论分析一些现实问题，开始形成新的学风。不少同学在老师指导下写出了有新意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受到学校和社会的赞扬。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繁重的工作和不规则的生活，李秀林得了严重的胃溃疡，日见消瘦，胃部经常疼痛难忍。但出于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和对学生的热爱，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从不叫苦，有时医生开了病假也很少休息。这一时期，他工资低，家庭负担重，母亲又得了癌症，来京治病直到逝世，花费甚巨，以至负债累累。然而这一切都未使他气馁，他忍着病痛折磨，肩负着生活的重担，依然积极活跃在教学第一线。他在实践中探索半工半读教学的特点，总结教育改革的经验，与肖前、张懋泽合写了《半工半读就是好》（《高教战线》1965年第1期）一文。接着，他又写了《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地实现从必然向自由的飞跃》，发表在《哲学研究》上。这些，既是当时半工半读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标志着李秀林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始迈出新步伐。

## 在“文革”风暴中

正当李秀林各方面走向成熟，准备向新的高峰攀登的时候，1966年夏季，一场剧烈的政治大风暴突然袭来。这场风暴来势如此迅速和猛烈，是中国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所始料不及的。

李秀林这时和大多数人一样，感到迷惘，不知所措。由于他一向受到校系领导的表扬和重视，教学和科研成绩突出，很自然地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黑苗子”、“黑线人物”和“保皇派”，多次遭到揪斗批判，戴高帽子游街，身心受到很大摧残。就在这时，他仍然满怀对党的忠诚，在横逆面前不灰心，期待着光明的复兴。他耐心地接受“批判”，诚恳地检查自己，交待“罪行”，到江西“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和接受“再教育”，同时默默地反省着自己和社会。

1971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迫解散。1973年，哲学系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李秀林一方面为失去曾经哺育自己的母校而感到痛苦；另一方面又为自己重新回到教学、科研岗位，再次有了用武之地而感到庆幸。尤其是对他这个曾经学教育学的人来说，师范大学似乎有某种特殊的吸引力。他很快就适应了师大的环境，担任哲学教研组负责人，在教学中发挥着骨干作用。由于长期心情压抑和不安定的生活，使他的胃病更加恶化，不得不动手术，胃部切除五分之四。这个时期，他遭受着精神上的和身体上的双重痛苦和折磨，常常独自一人陷入深深的沉思而不得解脱。

1975年，这是中国政坛上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先是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大整顿，继之是“四人帮”的猖狂反扑，中间经历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老一代革命家相继去世和“天安门事件”的爆发，最后是“四人帮”的覆灭。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同党和人民的命运一样，正在经历着深重的苦难和剧烈的阵痛，它的社会功能至多是充当政治运动的工具，很难有别的作为。这一年，李秀林调北师大理论组工作。李秀林这一时期的作品很少，思想上充满矛盾。一方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日益增长着强烈的不满，力求按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和理论工作者的原则去办事。另一方面，又不能公开与“上级指示”

相对抗，甚至不得不违心地去为一些错误的东西做表面上的“论证”。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迎来了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转折，盼来了中国理论界真正的春天。

## 拨乱反正时期

“四人帮”被粉碎，使李秀林卸掉了多年来强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政治枷锁。他深深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党的命运密不可分，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立即投身于批判“四人帮”的战斗和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工作。从1977年开始，他的理论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日见增多。如《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谈谈〈实践论〉〈矛盾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重大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7年第6期，与郑杭生合写）、《对立统一学说的新篇章——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一点体会》（《哲学研究》1978年第1、2期合刊）、《评“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北京日报》1978年4月17日）、《“四人帮”为什么要顽固坚持“精神万能论”？》（《南开学报》1978年第2期，与郑杭生合写）等等。他还参加或主持编写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专题讲座》（北京出版社1977年出版）、《〈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法》（与吴树青、郑杭生合写，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和《辩证唯物主义讲座》（哲学教研室集体编写，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出版）。这些文章和著作，对宣传毛泽东思想，摧毁“四人帮”的哲学基础，以及在哲学理论上开始拨乱反正，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标志着李秀林已经从长期受迫害和受压抑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焕发出活力，进入理论研究和创作的旺盛时期。

1978年春，中国人民大学在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下复校，重新开始招生。接着，理论界开展了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同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一连串重大事件，使李秀林激动、兴奋不已，他觉得这时才真正获得思想上的解放。他衷心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投身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中去，积极参加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实践标准与理论指导》（《哲学研究》1978年第10期，与丁叶来、郑杭生合写）、《真理不能有阶级性——驳“阶级的真理”、兼论人在真理面前应当平等》（《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1期，与郑杭生合写）、《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解决好面临的崭新课题》（为《教学与研究》撰写的评论，载该刊1979年第4期）、《没有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与郑杭生合写）等等。这些文章对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清除哲学理论研究与教学中“左”的思想影响，起了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1979年初，李秀林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亲自聆听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同理论界很多知名人士一起交换了意见，就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这次会议，他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明确了四项基本原则，对很多问题的认识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并及时地把这次会议的精神贯彻到教学和科研中去。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做了长篇发言，题为《总结历史经验 面对新的课题——关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几个问题》。在这篇讲话里，他着重探讨了在新时期如何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提出今后的理论工作必须防止把理论引向“绝对”的倾向，提倡要“吃透”中国的国情，全力捉住主要矛盾，一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他还写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要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



石上》一文，刊登在《学术月刊》（1980年第1期）上。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学说由于奠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两块基石上，才从空想变成科学；而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石上，则是保证这种研究的科学性的必要前提。要在研究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必须做到尊重历史事实，立足新的实际，尊重客观规律，注重经济分析。

## 理论创作的高峰

随着人民大学复校后工作的展开，教学任务也越来越重。1978年秋季起，李秀林开始担任研究生导师，并先后在本科、进修班以及后来的研究生班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备课认真，讲课内容充实，方法得当，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每次讲课都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有的同学说：“听李秀林老师讲课，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他自己也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注意充实新的知识，改进教学方法。

从1979年开始，李秀林受教育部委托担负编写新的哲学原理教学大纲和教材的任务，任哲学专业原理教材、文科公共理论课哲学原理教材的主编之一和教学大纲编写组组长。不久，由他主持编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和关于使用这个大纲的参考意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这个大纲又经过几次修改，至今仍在全国高校哲学教学及干部教育中使用。他还同高放、彭明一起，系统总结建国30年来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经验教训，写了《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工作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发表在《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上。

与此同时，李秀林的理论研究工作也在向纵深发展。他在《简论社会有机体》（《哲学研究》1980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社会有机体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表